

汉英对照

[美] 苏珊娜·麦克英泰尔 编 王毅 王昊 译

世界历史中的伟大演说

第一分册 古代世界（大约至公元 550 年）

SPEECHES IN WORLD HISTORY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汉英对照

[美] 苏珊娜·麦克英泰尔 编 王毅 王昊 译

世界历史中的伟大演说

第一分册 古代世界（大约至公元 550 年）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历史中的伟大演说. 第 1 分册, 古代世界: 大约至公元 550 年: 汉英对照 / (美) 麦克英泰尔
(Mc Intire, S.) 编; 王毅, 王昊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Speeches in World History

ISBN 978 - 7 - 208 - 10127 - 2

I. ①世… II. ①麦… ②王… ③王…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演讲—世界—选集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1467 号

责任编辑 金绮寅

封面设计 陈 楠

世界历史中的伟大演说(汉英对照)

第一分册 古代世界(大约至公元 550 年)

[美] 苏姗娜·麦克英泰尔 编

王 毅 王 昊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206,00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127 - 2/K · 1792

定价 28.00 元

前　　言

人类历史上第一位对自己的同伴群体发表演说的他或她，已经不知是谁了。也许，这是一个组织了一场狩猎或一次远征的人物，或者是发表讲话催促部落因天气变化或危险动物前来而另觅住处。不管此人是谁，他或她都开启一个漫长而富于变化的公众讲话的传统，这个传统穿越了众多的文明和社会，一直延续至今。

本书收纳了人类这个漫长传统中的一些最精彩部分。书中这些演说从中东古老文明诞生时开始，一直覆盖至21世纪；演说者中从国王到平民，包括各类人物，有时甚至是无名氏。有些演讲者，比如耶稣、穆罕默德，以及亚伯拉罕·林肯，都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列。其他演说者不那么为人所知，甚至不为人知，但他们留下的语言也同样雄辩。研究他们的演讲，我们可以学习演说，更可以了解人类状况。

这部《世界历史中的伟大演说》，收录了200多篇演说，演说者来自各大洲的各种生活领域，从那位中国统治者周公旦——他在大约3000年前帮助创建了中国的政治体系，一直到一位非洲女性（旺加里·马塔伊）——她因倡导环境保护作为通向世界和平之路而荣获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在本书中，你会读到美国历史中那些著名演说，会看到拉美历史上一些不为人知的演说，会领略穆斯林世界一些重要演说，会欣赏到来自古代的一些精妙演说，它们的主题超越了时代，直到今天仍被人们所讨论。本书选录的演说，包括革命演说和爱国演说，也有赞辞、布道、辩论、法庭演说和临刑演讲；还有议会中的演说和战争动员。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涉及它们那个时代的重大议题——人的拯救与正当的生活、战争、民主、奴隶制、各种宗教和种族偏见、殖民主义、民族自决、妇女权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核扩散、言论自由、恐怖主义、土著民族的权利，以及环境恶化。

政　治　演　讲

政治是人类生活中与演说联系最密切的一个领域。然而，并非所有政体都为

演说者提供了平台。独裁者和君主专制政体常常是除自己之外不允许任何人向公众发表演说，因为那些有力量的演说者会威胁到他/她们的权威。多元政体——共和国和民主政体，则珍视言论自由的价值，演说者的声音有广阔的空间。那些自由社会中的众多政治人物，依赖自己公众演说的能力而创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如古代世界中罗马的西塞罗和雅典的德摩斯梯尼，以及现代的温斯顿·丘吉尔、约翰·F·肯尼迪和贝拉克·奥巴马。

因听众不同和演说者说服目的不同，政治演说异彩纷呈，各不相同。有时，演说者是一位统治者或权威人物，是对臣民或下属发布命令，或者是激发他们的忠诚和热情。（这一类演说者并不限于国王和独裁者，拿破仑这样的将军也可归入此类，他们向自己的军队演说；还可包括列宁这样的革命领袖，他们以演说激励自己的跟随者。）有时，演说者向与自己一样的人发表讲话，比如立法机构中的演说，威廉·皮特就曾绝望地试图说服英国不要导致与自己美洲殖民地一刀两断的结果。立法机构中的演说，可围绕相关论点和事例来组织，以呼吁采取某种行动作为结束；也可以诉诸听众的情感。立法机构常常有特别的规定，演说有时限，哪些事情可以说，哪些事情不可以，都有制约，如英国国会和美国国会的详尽法规就是如此。它们禁止议员们彼此以姓名相称，在英国国会中必须这样称呼一位议员：“威斯敏斯特的可敬议员”。

有些政治演说者是对上层社会之外的民众发表演讲，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一些反殖民主义领袖，包括西蒙·玻利瓦尔和莫罕达斯·甘地，就对穷人和被压迫者发表演说，以动员他们进行暴力或非暴力的行动。在那些政体开放的国度，演说者会对普通民众发表演说，倡导某种政策，或者是期待在选举中赢得选票。这样的“竞选演说”可以勾勒出某种议题，但对它们的论证却常常并不重要。许多“积极”的竞选演说，其真正重心是说服听众，告诉他们这位演说者的确是好人，与他们的看法一致，值得投他的票。那些“消极”的竞选演说则试图让听众相信演说者的对立面不值得他们支持。

演说也常常是各种仪式的组成部分，比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就是内战战场纪念地的献辞。仪式上的演说与竞选演说大为不同。在仪式上演说，如果演说者把人们的注意力过多引向自己，或者是攻击政治对手，都会被认为是粗鄙。如同林肯这篇演说一样，谦卑基调比起自吹自擂来，效果常常要好得多。仪式演说的重心，应该放在把演说者和听众带到了一起的这个场合之上。

宗教演讲

在竞争的、有时甚至是此起彼伏的纷争中，演说者发出声音的另一个地方是宗教领域。数千年来，宗教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演说。那些世界主要宗教——比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创建者，都以他们的说服力和说话能力而著称。犹太教的信息，靠着耶利米这些先知的声音才如此强有力地表达出来，他无畏地痛斥犹太社会的生活未能做到自己神灵的要求。上述种种宗教，以及其他许多宗教，都发展出来了自己布道传统，它们常常与一些仪式融合起来，比如基督教的周日布道或伊斯兰教的周五宣读。

宗教演说者与政治演说者在使用术语上有许多不同。与其说是宗教演说者是演讲者，不如说他们是布道者，他们的演讲不是一般的演说，而是布道。然而，即使如此，在实践上，两者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同一位政治演说者，一位宗教演说者也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听众。宗教演说者有时对那些早已是此宗教信众的人们讲话，进一步说明教义和法规，或者是敦促听者更为虔诚。克莱尔沃古的圣伯纳德和其他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布道者”的使命，就是说服忠诚的基督徒发誓去参加十字军东征。另外，宗教演说者也对非信众发表演说，尤其是在一种宗教的早期，或者是通过传教士的工作扩展至新的区域时，比如7世纪和8世纪时那位朝鲜佛教僧侣无相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在这类演说中，演说者必须让自己的宗教信息尽可能地具有魅力，以吸引那些还不认同这些宗教假设的人们。当一种宗教建立起来后，一位教区的主持人或会众组织者，就可能利用每周一次的布道来对他已经很熟悉的社区讲话，建立起一种能持续数十年的关系。另一方面，像约翰·韦斯利这样到处游走的信仰复兴运动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对完全陌生的听众发表演说，这些听众他们以后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了。所以，他们的演说全靠能够打动听众的主题。有时，宗教演说者会宣称自己直接从他们的上帝或神灵那里得到了启示。这些宣称获得了神启的狂热演说者（“狂热”一词在希腊文中，原意就是被神灵所占有），常常被业已建立起来的宗教层级视为一种威胁。

如同政治演说一样，宗教演说在主题和基调上也多有不同，从“复兴派”的诉诸感情，到那些敷衍塞责的简短布道，什么都有。有些布道者针对的是听众的智力，把自己的演说建立在逻辑论证上；有些则针对情感，靠修辞吸引力和语调的抑扬顿挫来打动听众。“地狱之火”派的基督教传教士，生动地描述被诅咒者

受到的痛苦折磨，以此恐吓听众去悔改。一些传教士则讲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或者是天堂的欢乐。有些宗教演说是专门用于特殊节日或仪式场合的，比如基督教牧师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布道，穆斯林教讲道者的斋月宣讲，或者是泰国佛教僧人的阿沙茶节（Asarna Bucha）。听众预期着这样的宣讲，再一次地关注那些早已熟悉的形象和观念。比如，圣诞节布道就总要谈福音书上关于耶稣诞生的记述（也就是有这个节日的原因）。

当然，由于历史上宗教与政治的缠绕，宗教演说和政治演说从来没有截然分开过。许多政治演说中都有一些朝向上帝的修辞呼吁，那些宗教成语一直对政治演说者大有影响。美国选举中的候选人在竞选演说中都要谈及上帝，谈及他们的信念。美国民权领袖小马丁·路德·金，是一位正式任命的牧师，就使用非洲裔美国人的布道传统来发表政治性质的演说。世界各种宗教的宣讲者们，在自己的布道中也包含着政治信息。

法 庭 演 讲

法庭常常是演讲者的一个舞台。一些最著名的演讲者同时就是律师，他们因在公共场合的演说和法庭上的演说而著名。法律体系的不同，案件的不同，背景的不同，这些使得法庭演说的作用各不相同。比如，一位律师在美国最高法院上讲话，所使用的修辞策略，与一位律师在刑事审判中对陪审团说话，会颇为不同。一场法庭演说可以是平静地叙述证据和相关法律，也可能是充满感情的呼吁，以打动陪审团或法官。在法律背景中发表演说的并非只有律师。有些法律体系也允许被告发表陈述。即使是苏联那种压制性的法律体系，也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纳坦·沙兰斯基在受审时发表陈述。那些被判死刑者在临刑之前甚至也可以讲话，或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或表达对自己罪行的悔意。英王查理一世在断头台上的动人讲话，对那些听众和后来的读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律和政治体系纠缠在一起，从古至今，一些最伟大的政治演说者也都是强有力的法律演说者。西塞罗在审判时的演说，与他在罗马元老院的政治演说一并存世。19世纪时，与许多人一样，丹尼尔·韦伯斯特也因他在法庭上的胜利和在美国国会的胜利而著名。一位法庭律师的技巧——有效的辩护和情理兼具地打动听众，也常常是政治演说者的技巧。

演说与性别

历史上绝大多数时候，演说的主要领域——政治、宗教和法律，都是男性占有的。许多社会都将“公共范围”界定为男性的，将女性归入“私密”或“家庭”的范围。敢于讲话的男人被赞扬，敢于讲话的女人却常被形容为“河东狮吼”。温顺安静，而不是演说才能，被视为女性的美德。正是由于这种原因，20世纪之前女性重要演说的事例很少，一些罕见的例外基本都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这样的讲话。随着20世纪政治和宗教活动及领导地位慢慢对女性开放，就导致了女性演说的巨浪。以色列的戈尔达·梅厄，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缅甸的昂山素季，这类女性在领导共和政体，在立法机构中服务，成为了政治党派和政治运动的领袖，她们的声音在公众集会上、法庭里和宗教聚集中被人们倾听。

“修辞学”的艺术

演说对于人类社会是如此重要，所以人们就研究怎样最有效地演说。演说之根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当时对演说的研究被称作“修辞学”，也就是说服性演说的学问。修辞学吸引了古代世界最智慧的一些头脑，包括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也是古代学校核心课程的一部分。到了中世纪，人们对拉丁修辞学的兴趣减弱了，但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兴趣又得到了复活。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人文主义者”，也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及其留存文献的研究者，将修辞学视为古代世界最珍贵的遗产之一，在自己创建的学校中展开对它的研究。修辞技巧与领导艺术紧密相连，它被讲授给上层阶级，这些阶级被期待去占据政府、教会和私人企业的威权位置。

古代世界一些最精妙的演说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要归功于它们成为了修辞学校中的教材。这些演说当年所针对的对象已化为尘埃，但数百年后学生们仍在背诵和高声朗读西塞罗、德摩斯梯尼及同时代人的那些演说。修辞学家们讲授各种“修辞格”的使用，讲授不同的演说风格，包括词藻华丽的“亚洲”风格，也包括简洁、不事修饰的“雅典”风格。修辞学家们教导自己的学生何种风格最适宜于何种场合。他们还教学生演说的技巧，怎样以适宜的强调来清晰讲述，怎样最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和手臂。一代一代的男孩——修辞学主要作为一种男性的、“公共场合”的技巧来讲授，被训练怎样有效地说话，他们作为富有技巧的

演说者，无论是否受过训练，都会被人们所欣赏，甚至包括那些不赞同演说者立场的人。在现代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修辞学和辩论一直被讲授，但现在是男女学生同学了。

口语演说和书面文稿

起先，听一场演说的体验是会逐渐消失的。要想倾听和理解一位演说者，你就得到现场去。当书写发明之后，演说就不再总是随着演说结束而迅即消失了。它们中有些获得了长久生命，持续了数百年或数千年。然而，这种生命是不完美的。如同其他的文献记载，演说开始时也必须手抄保存。每份手稿复本都得花费熟练抄写者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劳作。很少有抄写者是完美的，所以讹误就溜了进来，随着对稿件的一抄再抄，错误越来越多。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许多演说如同其他文献一样，就湮没了。

在西方世界，从15世纪开始——在亚洲东方要更早一些，随着印刷机的发展，包括演说在内的书面文献，其流通大大加速。有些演说因书面印刷而扩大了影响，超过了它们被现场讲出来的效果。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是在漫长的一天将要结束时讲的，在林肯之前还有一位学者爱德华·埃弗雷特做了一场两个小时的演讲，所以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它。今天，它却被认为是美国历史最伟大的演说之一。

不管如何复制，演说的书面文本只有两类：一类是演说者朗读的准备好的文稿，另外一类就是对演说者所言的抄本。以前，演说者不一定就是演说辞的作者。看到一份写定的演说，人们想到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写定的文稿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演说时的真实情况？撰写一篇演讲稿与进行这场演说，这需要不同的技艺，而且常常由不同的人来完成。许多需要进行演说的人对撰写稿子或者是没有兴趣与精力，或者是没有时间。所以，数百年中都有布道演说的文集出售，买主是那些不能或不愿撰写稿子的布道者们。20世纪出现了政治演说撰写人这个行当。人们很少相信有现代政治家，尤其是在美国，是他们亲自撰写了演说稿，至少也是靠着别人的大量帮助。传统而言，演说稿撰写者是藏在幕后的谦逊者，演说者被礼貌地当作这篇演说的作者。然而，现在许多演说撰稿人自己就成了名人。西奥多·索伦生——约翰·F.肯尼迪的演说稿撰写者，佩吉·诺南——替罗纳德·里根撰写演说稿的人，就是这样两个例子。

阅读演说稿只相当于听到、看到这篇演说现场情况的一个苍白影子。一位卓越的演说者远远高于一篇文稿的朗读者。在一些词语上的强调，音调上的抑扬顿挫与节奏感，一篇写就的演说稿就变成了口语演讲。不仅是口头表达很关键，而且演说者的手势，甚至他的身姿，也都很重要。一位用眼睛与听众交流的演说者，所传达的信息完全不同于那些眼睛看着天上的演说者。许多伟大演说者的演说稿，读起来颇为平淡乏味，就是因为丧失了口头表达时的闪光。同样，一篇写得精彩的演说稿，如果演讲乏味，也会失去其力量。演说者常常会即兴发挥或是偏离写好的演说稿。演说的记录稿常常已是“经过整理”，演讲时的失误、犹豫和即兴都已被清除。口头演讲与发表的演讲稿，它们之间的差别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修昔底德和萨卢斯特这样的古代历史学家，都认为对演讲进行大改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虚构演讲，放入自己的历史著述中。他们让一些历史人物来做一些演讲，以强化他们的史著作为一个整体的主旨与分析。

演 讲 与 技 术

演讲在起源时并不是一种需要技术手段的活动，演说者所需要的只是声音（最好是响亮的声音），或许还需要一个站立于其上的高台。（“政治演说”[stump speech]或“肥皂箱演说家”这样的词语，讲的就是演说者站在高处对聚集的听众进行演说的原始方式，使用了树桩或装肥皂的板条箱。）不过，演说，尤其是20世纪的演说，已经深受技术发展的影响了。

20世纪出现了若干影响了演讲的新技术，包括喇叭、录音和录像，以及广播技术。喇叭和其他扩音系统，使得演说者不再受限于人的嗓音，原来那种让人声音响亮、大叫，以便数千听众都能听见的演说训练，已经成为过去。今天的演说者用不着抬高嗓音，就可以对数万听众演说，尽管他或她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学会用麦克风。

现在，听众甚至已经不需要到现场去倾听一场演说了。收音机和电视机使得演说者能够对多达数百万的“虚拟”听众讲话。一边干自己事情，一边听政治家在电视上或广播上发表演说，这样的听众远比现场聆听的人多得多。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对演说家的评价越来越看重他们在广播或电视上的表现如何。美国的政治会议一贯是演说家们的展示天地，现在也按电视转播来组织了，坐在会议大厅里的听众摆出一个场面，真正的听众是观看电视的数百万人。新技术也改变了

如何使用本书

这本《世界历史中的伟大演说》按年代顺序编排，将演说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这些演说者创造了历史上的一些伟大时刻，或者是目睹了一些伟大时刻，阅读他们留下的话语，读者可以对历史上的那些重大事件产生新的看法，甚至是对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产生新的看法。

体悟这些演说者怎样安排论点，怎样对不同的听众各有侧重，怎样情理兼具、力量强大地感染听众，本书的读者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较好的演说者。

本书的演说类型多样，涵盖各个国家，读者可以找到自己最有兴趣的材料。这200篇演说取自48个国家，包括了政治演说、断头台演说、赞辞、布道、辩论，以及指挥官的战前动员。

本书编排

依据美国所使用的世界历史分期标准，本书分为六章：古代世界（至公元550年），拓展的世界（550—1450年），第一次全球时代（1450—1750年），革命和帝国的年代（1750—1900年），危机与进步的时代（1900—1950年）和当代世界（1950年至今）。

每章前面都有一篇介绍，将本时期的这些演说置于一个整体历史背景之中。每篇演说的前面都有一个基本情况框，列出了这位演说者的姓名、生卒年代或统治时间，以及这篇演说的标题、发表它的地点和时间。每篇演说前还有一个简介，介绍演说者、发表这篇演说的背景，以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等基本情况。每篇演说的后面，附有此篇演说的来源出处。

由于篇幅限制，本书中有些演说只能是节选。出现这样的情况时，本书选取一篇演说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者是最著名、影响最大的部分。

本书插图

本书有75幅插图，以显示演说者们的个性和历史场景，它们包括从亚历山大大帝的一幅镶嵌画，到非常年轻的莫罕达斯·甘地坐在自己首次开业的律师事务所里的照片，以及冷战中的对手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一次首脑宴会中祝酒的场景。

修辞技巧和名句摘录

演说的美妙和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修辞技巧，所以本书中安排了很多方框，里面是一些演说中的例证，以解说44条不同的修辞技巧，如暗喻、排比、尾词重复、反问和夸张。在有些例证中，你会发现演说者同时使用了多种修辞技巧。

修辞技巧是一些工具，演说者可以使用它们来确保听众聚精会神。它们有助于吸引听众去注意演说者想强调的东西，甚至会唤起听众的情感。这些修辞技巧中，有许多广泛应用于写作甚至是日常说话中。还有一些修辞技巧——大约有数十条，则需要更有意识地使用。不要被它们不同寻常的名称吓住了，它们有许多出自希腊文。有些修辞技巧在一篇精彩的演说（或者是一篇研究论文）中已经没有用了，而且，你未必想在一篇演说中使用太多的修辞技巧吧！

书中还有一些方框，摘录了本书一些演说中的名句。

本书的附录*

本书的附录包括三篇文章，在演说和撰写演说稿上提供一些帮助。第一篇文章是《怎样撰写富有说服力的演说》，描述了撰写演说稿的过程，这就是选择一个主题，用一个主张、相关的支持论据和结论来构成一篇演说；以及怎样使用修辞技巧让听众感受到演说者的真诚，从而唤起他们的情感。

第二篇文章是《怎样发表一篇好演说》，里面包括这样一些问题：怎样进行事先练习（甚至可以使用本书中这些演说来进行朗诵训练），发表演说时步态、身姿和语言的适宜。

第三篇文章《使用演说作为原始文献来源》提供了一些相关论点，以供在历史研究中使用演说：演说者的观点和信息，他在语言上的选择，他的听众，他发

表这篇演说的背景，以及他可能存在的偏见，都可以是历史研究中的素材。

在本书的结束处，读者会看到一个“参考书目”，它里面包括印刷物和电子出版物。最后是本书的各种索引，读者可分别从演说的标题、演说者姓名和演说者的国籍进行索引；另外还有本书介绍的修辞技巧的索引，以及一个字母排序的总索引。

* 出版者按：本书已将这三篇附录放在《如何使用本书》之后，修辞技巧索引只保留术语部分，考虑到篇幅，其他索引及参考书目皆已删去。

怎样撰写富有说服力的演说

任何好的写作都意在以某种方式来说服读者或听众。即使是虚构作品，也想诱导读者去相信作者想象出来的那个世界。有些写作尤其想进行说服，比如报纸的社论，商业广告、求职信等，演说稿的撰写更是如此。

一般而言，演说的目的是用某种观点说服听众，或者是向他们建议应该做某个事情。一个好的主题常常会展示不同意或同意的一些方面，或者有一些必要的变化，或者是指出需要强调或提出的看待问题的其他思路。演说者的目的就是引导别人以他的思路来看待某个问题。

演说的主题集中于一个观点或一个问题，而不是泛泛而谈，效果是最好的。想一想葛底斯堡演说吧，林肯只谈一个主题——对战死者的尊敬，写出了美国历史上最精彩的演说之一。政治家爱德华·埃弗雷特——那天的一位重要演说者，发表了一篇两个多小时的演讲，触及了许多问题，但未能留下来一句清晰的论断。

谈论自己熟悉的主题，演说者总是更为成功。这或许意味着去选择一个你已经知道得很透的主题或“论点”，或许意味着去做研究，对要讲的问题做到心中有底。比如，就当地某个问题发表演说，你要与当地人接触，了解他们的看法，要阅读报纸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报道。一位演说者越是熟悉自己的话题，就越有可能以材料去说服听众。

在撰写演讲稿之前，先把自己立场的要点简要列出来。一定要想一想“对方”会怎么说。这样，在你的演说中，通过说出对立方可能会有的反对，并据此为自己辩护，你就有了消除潜在敌意和疑虑的机会。

在演说的开头部分，要以一种肯定可引起听众注意的方式来说出你的主张或主要观点。1775年的第二次弗吉尼亚会议辩论是否让殖民地武装起来反抗英国，帕特里克·亨利那篇“不自由毋宁死”著名演说的头两段就是这样做的。他首先称赞了其他演说者的爱国主义和能力，然后说自己对殖民地目前的局势有另外的看法。“摆在本次会议面前的问题，”他说，是“一个事关自由或奴役的问

题”。注意：他的主要观点并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看法，一个论断，一种立场的说明。

在一篇演说的主体中，演说者要提出论据来支持这个论断。论据可以是例子、事实、专家看法、轶事，甚至是数字。查尔斯·戴高乐在“6月18日呼吁”中（当时是1940年，纳粹德国已经几乎征服法国，戴高乐将军逃到了伦敦），他给出了他的理由——为什么所有地方的法国人都不要放弃：法国仍然有着它的朋友和帝国，法国并不是唯一被攻击的国家，法国可以使用由美国提供的战争物资。当然，他说这些并不是用单子列出来，而是用精彩的简短段落，使用了演说艺术的一些“窍门”。这些窍门中的许多方面就是所说的修辞技巧。

比如，戴高乐没有说“法国仍然有她的朋友”。他使用了“克制陈述”和重复的巨大力量，这样来说：“因为法国并不孤立！她并不孤立！她并不孤立！”

以这样的方式，修辞技巧就使得演说生动起来，有了吸引人的、听起来悦耳的风格。（本书各处方框中有许多修辞技巧的使用例证。）

有了这些修辞技巧，演说者就可以用微妙的方式来诉诸听众的情感，这很像音乐诉诸人们情感的方式。修辞技巧还有一个重要的用处，那就是强调一篇演说的要点，帮助听众把注意力放在演说者想让他们注意的地方，充分理解意思。

这些修辞技巧中有很多人们早已熟悉，你写作或演说时会自然而来。另外一些则是有意使用，尽管有些与语文老师讲解语法和文风时提出的忠告相冲突，比如重复和冗余，甚至是句子的不完整。学习去认识这些，对于修辞技巧在演说中能起什么作用就会获得一种感觉。（不要被它们的希腊和罗马名称吓住了！）比如，反问的使用（提出一个反问，演说者并不给答案），会使听众有一种自身被带进来的感觉，因为这个问题在他们脑海中激起了种种可能的答案。以某种方式来重复词语和短语，对于吸引听众警醒于演说的要点是非常有效的。

在你演说的展开中，诉诸听众的情感，或者是来一段轶事，也很起作用。有没有演说者自己的经历可以用上？某个小故事是否吸引听众？打动听众的情感，可以让一篇演说久久难忘。比如，1985年，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拒绝了只要他放弃自己的反种族隔离活动就可释放出狱的建议。他从自己的牢房中偷偷传递出一篇演说，由他的女儿代为发表。它里面有这样的话：“我非常珍惜我自己的自由，但是我却关注你们的自由。从我入狱后，有太多的人死去，有太多的人为了自由而受难。我对他们的寡妻、他们的孤儿、他们的母亲和他们的父亲欠得太多，这些人在为失去的亲人悲伤、流泪……我不能出售自己的天生权利，我也不

准备出售那些追求自由者的天生权利。”谁能够听到这样的话后而不被打动呢？当然，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有这种演说的，但即使是最小的论题，采用这样的做法也可以打动听众。

撰写一篇演说的结束语，重申你的立场，提醒听众，以一种简洁有力的方式概括你的论点，这很重要。听听1913年英国那位女性选举权活动人士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是怎么说的。在演说要结束时她这样说：“你们既然要统治英国的女性，何不把选票给她们？！”为了让结尾更有力量，她又使用了“先问先答”这种修辞技巧来解除反对者的论点：“你们是不能统治我们的——如果我们拒绝被统治的话。你们说，政府靠强力。完全不是这样。它靠赞同，女士们先生们，而女性正在撤回她们的赞同。”

在她结束的那句话中，潘克赫斯特宣布了她的结论——女性将要做什么。印度民族主义者和改革者莫汉达斯·甘地1906年的一篇演说也以类似的方式来结束，他预言：“哪怕只有几个人坚守了他们的誓约，这场斗争就只有一个结果，这就是胜利。”结束一篇演说的那句话，可以是一个推荐，让听众知道你想让他们去做什么。波瓦坦对弗吉尼亚殖民者约翰·史密斯队长的那篇演说，最后就这样来结束：“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坚持把那些枪和刀剑，把导致我们所有嫉妒和不安的这个原因，拿走，送走。”

一篇演说的最后之语也可以是一种挑战，一种对采取行动的号召。美国总统顾问伯纳德·巴鲁克1946年对联合国发表演说，倡议控制核武器。他的结束之语是：“这个解决方案需要显而易见的在骄傲和地位上的牺牲，但是，和平的痛苦代价总比战争的死亡代价要好。”

当一篇演说稿起草完成后，把它放置一两天，然后再来修改。这种修改可以显示出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远比你写完即改要好。然后，大声朗读它数遍，做一些细小的改动，让它读起来更流畅。一位好的演说者要对演说稿非常熟悉，在发表演说时很少要去看稿。不过，去演说时还是带上稿子，尽管似乎已经不再需要它了！

怎样发表一篇好演说

学习修辞术或演说术这种公众讲话的艺术，是2000年前精英阶层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那以后的多少个世纪中也是如此。直至19世纪，孩子们在学校仍要学习朗诵，用前人的演说稿来练习演说，那些稿子的作者常常是著名的演说大师，比如古希腊的狄摩西尼或古罗马的西塞罗。这些学习演说术的学生，学成之后去撰写和发表自己的演说。

在今天的学校中，除了一种课外活动——辩论外，已经没有时间来练习修辞术。然而，对公众发表讲话，这几乎是每个人一生有些时候必须去做的事。在教堂里读一段祷文，在学校开会时说一个通知，或者是参加一个辩论俱乐部，类似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就得对公众讲话。

本书汇集了许多演说，包括不少今人的演说，可用于朗读。通过用他们的稿子来练习演说，你可以从中学到很多，这就如同画家有时通过临摹大师的画作来学习一样。录音和网络也使得我们可以去聆听和学习今天那些演说者们的演说。

一篇演说通常总是有一个稿子的，能够不事先写稿和练习就发表精彩演说，这样的人是很少的。当然，演说者可以脱稿，但事先写稿却可以保证那些重要观点和内容要点不会被忘记。

在古代（以及那些没有书面文字的文化中），一位演说者必须记住他的演说内容，在没有文字稿（或者是讲词提示器）的情况下发表演说。今天，听众看到演说者带着演说稿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如果演说者在整个演说过程中就是低头读稿，那他们会不高兴的！为了防止这一点，或许可以把稿子印成大字，比如16号字，这样你就可以边看看听众，边轻松地找到文字内容了。（如果你不习惯于看听众的脸，那就在人群中找一个可以从容去看的关注点。）可以把稿子排成许多短段，甚至在各段之间空上一行，这样朗读起来就较轻松了。

成功的演说者会掌握演说过程中说话的快慢节奏。要避免初次演说者的通病——讲得过快。讲得过快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当人们感觉紧张时，就想赶紧结束。然而，“赶紧结束”却不可能是好的演说。怜悯听众吧，从容来讲吧，他